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晓原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关键词:周作人;散文;主体;文本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3)05-0042-07

周氏兄弟——鲁迅(周树人)与周作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卓然兀立的。郑振铎认为,"只有鲁迅、周作人还是不断的努力着,成为新文坛的双柱。他们刊行着《语丝》和《莽原》,组织未名社,在新文学运动里继续的尽着力。"[1](P8)而就现代散文史的建构而言,周氏兄弟无疑是璀璨悦目的双子星座或曰矗立于散文天地的双峰。就其主导方面说,鲁迅是现代杂文的奠基者和主将,而周作人则是现代小品文、美文创作系统中,具有统领作用和标志性意义的作家。1936年5月,鲁迅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有关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最优秀的散文杂文作家的提问时,将周作人列为首席。

周作人创造了别具滋味的散文,而散文则雕塑了他作为文学大家的丰碑。"散文的周作人",不仅意指周作人对于现代中国散文发展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意义,而且更着意于周作人与现代散文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与周作人"散文化"的心理结构、人生意趣、审美取向等是紧密相关的。"散文的周作人",表示着周作人个人的气质、个性、审美态度、人生哲学等一系列独特的主体存在与散文这一文体的体性之间实现了高度的契合。惟其此,散文成为周作人的一种身份,周作人则成了散文的一种品牌。

一

周作人有着一种非诗、非小说的心理,有一种与生性相联的散文情结。周作人在《永日集·桃园跋》中将自己与废名(冯文炳)作比较,"废名君是诗人,虽然做着小说;我的头脑是散文的,

* 收稿日期:2003-04-26

作者简介: 晓原(1958-),男,江苏常熟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唯物的。”[2](P79)周作人在这里将诗与散文对举，其中包含着他偏爱散文(“散文的”)和禀具散文的思维方式(“唯物的”)的两层意思。周作人曾在新文学运动创始期发表过不少诗作，其中，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长行新诗《小河》，被胡适视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3](P198)但周作人“散文的”心理结构规定了其诗作又有非诗的一面。对此，周作人自己甚为了然。他以为自己的“‘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4](P1)对于小说，周作人径言自己并不喜欢。他在《东京散策记》论说日本作家永井荷风时有言：“永井荷风最初以小说得名，但小说我是不大喜欢的，我读荷风的作品大抵都是散文。”[5](P287)由此可见，在各种文体中，周作人是最为亲和散文的。一般而言，周作人的心理结构中缺少写诗所需要的激情，写小说所需要的虚构编织故事的想象力。周作人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弱项是显见的。对此，周作人自己有一表白。他说：“我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慰安，夹杂读书，胡乱作文，我平常喜欢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无聊赖的闲谈。”[6](P2)用文字与友人、读者“谈话”、“闲谈”，成了周作人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而这种语言物化了的“闲谈”、“谈话”，即为散文的一种体式。

散文是一种边缘化的“泛”文体，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散文主体以及接受者，对其精神品质以及表现形态，有着不同的指认与阐释。周作人选择的散文，是一种渗透着时代与个人诸多因素的具有现代质性的文体。周作人是现代最具有自觉的散文意识、操守为其所体认的散文观的作家。他所认同的散文是体现着文化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新的价值取向的具有新内质与新形态的文体。这种文体在现代包含了被周作人所命名的“美文”，或者为更多人所指称的小品文，其基本的文体精神由日本文艺家厨川白村作了揭示。

厨川白村强调主体自由从容的精神状态对于散文写作的意义。他认为：“和小说戏曲诗歌一起，也算是文艺作品之一体的 Eassy，并不是议论呀论说呀似的麻烦类的东西”，而只是一种“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的记录。Eassy，散文，是说话的另一种形式，“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7](P113)“纵论”与“即兴”，不仅表示着主体的精神存在是丰裕的，而且是自主自由的。这一类 Eassy，其价值取向的设定中，首先关注的主要不是道德的社会的价值，而是写作主体本身的精神存在及其欲求。这应当是一种无所遮蔽，无所拘羁，凸现主体“本来面目”的物化的精神存在方式。厨川白村更重视散文对于自我的表现。他指出：“在 Eassy 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7](P113)厨川白村的这种散文观深为获得现代性洗礼的中国作家所认同。他们在阐释小品文的文体特质时，强调的也是表达的“随便”和通过“随便”的表达所凸现的作者的个性。梁遇春在《小品文选·序》中认为：“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并没有俨然地排出冠冕堂皇的神气，所以这些漫话絮语能够分明地将作者的性格烘托出来，小品文的妙处也全在于我们能够从一个具有美好的性格作者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8](P37)梁遇春这一表述所用的关键词及其意蕴，与厨川白村的十分近似。“轻松”、“随便”、“漫话絮语”，不仅给出了小品文作者的叙述态度与作品的形态特征，而且更凸出作者精神世界的一种可人的姿态。现代研究小品文的专门家李素伯著有《什么是小品文》，也强调小品文对于主体个性人格的表现，径直称之为“自我表现”。他指出：“正如一切的文艺作品一样，自我表现为作品的生命，作者个性、人格的表现，尤为小品文必要的条件。”[8](P41)归结以上诸论，我们可见所谓小品文——现代散文存在形态，它是一种自由的、真实的、个性化的文体。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作为现代散文创作体系中的领衔人物，周作人操守并实践的正是这样的散文观。他以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9]（P231）“王纲解纽”导致社会文化生态的宽宏自由，而这为知识分子的自由言说创造了特别重要的社会条件。诸种具有现代性品质的文体，如杂文、报告文学、小品文，它们的发生、兴盛以至于蔚然可观，莫不关联着“王纲解纽”的社会条件和主体自主实现的个人诉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都可以被命名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三种文体表示着知识分子类型的作家，他们具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精神形态与写作心理。写作杂文，表示着作者对于知识分子批判使命的担当，这种批判以形象化的论理呈现；写作报告文学，表示着襟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这种关注以文学化的报道展示；写作小品文，则表示着作者对获得精神自主的主体自我存在的尊重。这种尊重，主要以叙事、抒情的话语方式，表达着对个人的心灵世界或生活空间的自赏、自叙、自诉。小品文是作家得以自由尔后可以随便而说的一种闲话。小品文的时代，一方面当是“王纲解纽”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正在瓦解，或者是主流意识形态有了自信而认可了个人空间的存在；另一方面当是作家主体意识自觉的时代，他或她以一种自主的方式进行自由而理性的写作，因而这种写作更具有鲜明的个性。周作人将文学分成“载道”（“集团”）和“言志”（“个人”）两派，将小品文归入“言志”的一脉：“小品文则又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9]（P232）

在周作人这里，小品文（散文）成为其精神酿造的载体，写作小品文成为其精神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周作人强调小品文应有“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的意蕴滋味，实际上强调的是对主体自我的尊重与表现，表征着现代文化人对主体精神自由的渴望和欣赏。在周作人看来，“中国人的大病在于喜欢服从与压制，最缺乏的是对于一切专制的憎恶。”[10]（P75）周作人之作“叛徒”、“流氓”，这自然是因为他不满于文化的专制与奴化。他说：“我从民国八年在《每周评论》上写《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以来……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伦理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这种态度当然不能为旧社会的士大夫所容，所以只可自承是流氓的。”[11]（P213）周作人之作“隐士”、“绅士”，除了表示他逃避紧张的社会现实外，同时，“隐”而有为的实际，也反映了他对作家职业精神的自守。周作人通过写作“闲适”小品，拓殖主体丰裕多姿、自主有容的精神空间，表示着对逼仄的现实的不满，对人的精神自由的诉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无论是“叛徒”，还是“隐士”，贯注在周作人小品中的基本精神就是主体的自主、自由、自适。而这也正是周作人散文观的基本内核。

二

周作人的非诗、非小说与对散文的热衷，以及对散文某种精神内质的认定，关联着他的哲学意念与人生旨趣、个性倾向。周作人信奉中庸哲学。他表白：“我的理想只是中庸，这似乎是平凡的东西。”[12]（P1）他将“闲话”写作散文小品，视为中庸之道的表达与求取。他说：“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我很喜欢闲话，但是不喜欢上海气的闲话，因为那多是过了度的。”[9]（P184）“中庸”是一种适度，一种和谐，一种趣味，而这就是周作人所心向往之的人生境界。他通过有选择性的读书或写作方式，追求中庸的人生境界。他读书，“很想找一点温和的读，正如一个人喜欢在树荫下闲坐，虽然晒太阳也是一件快事。”[14]（P189）而于作文，则“不把文章当作符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咒或皮黄看，却只算做写在纸上的说话，话里头有意思，而语句又传达得出来。”[15]（P648）读“温和的”书，写“说话”似的文章，不急不躁，心平气和，就有一种中庸而得的舒心写意在其中了。周作人对于偏离中庸之道的存在，往往给予否定性的评价。“凡过火的事物我都不以为好”，“我个人不大喜欢豪放的诗文，对于太白少有亲近之感”。[15]（P229）周作人厌弃李白创作的“夸”，因为在他看来，“豪放”或者“夸”，不符合他所认同的中庸原则。可以说，周作人信奉的中庸的哲学信条，规约了他对人生美与艺术美的理解与实践。就人生而言，“缓缓的，从从容容的赏玩人生”，[14]（P191）便是一种美好的人生；就文学而言，那种“浸在自己的性情里”、“任心闲话”，就是一种“美文”。中庸之道的设定，生成了周作人人生与文学的基本格调。

作为旧文化的“叛徒”，周作人曾经写有许多旨在进行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的杂感。然而他最终又相信文学个人表现的观念：“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15]（P8）基于这样的观念，在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状况中，周作人更多地写作不以道理承载为务，而是通过个人生活与人文化自然风俗的记写，着意表现人性风情的美文小品。文体由杂感而偏至美文小品，表示着作家的关注点由社会而偏至人生自然，作品的价值由重于即兴的社会意义而偏至滋润的审美意味。这种偏至使得周作人那种生活的艺术，艺术的生活，联通生活与艺术的追求成为了一种现实。周作人认为：“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10]（P87）周作人以散文这一艺术的形式，去描写“微妙”的、“美”的、“艺术”的生活，使生活的形态升华为艺术的形态。这里，促成升华的关键，在于作家对生活中蕴含的艺术因素要有一种充分的感悟与相宜的表达。

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意味着一种非功利的精神至上性；从生活中提取艺术的成分，则表示着对寓于生活日常性之中的粗鄙的过滤。周作人的小品散文，有一可人之处在于作品表现出了那种颇为精致的诗性生活形态。诗性生活是超越生活功利的另一种存在。“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10]（P46）周作人所说的“生活上必要的”东西，不是一般寻常人的生活需求，而是一些在精神领域中有贵族化倾向的文化人的梦寻。他们憧憬着过一种诗意的生活：在“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雨的冬季，“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10]（P1）置身于这样的意象化了的情景中，“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10]（P48）这正是周作人所求取的人生意趣或曰人生理想。作者从他所构筑的散文憩园中，获得精神的休闲，从对人生景象的感悟中寻得一种精神的抚慰。而于他的读者而言，同样也会产生这样的快意。

散文写作是周作人的人生方式。他向往的是一种自如淡远的人生，因此，他往往提取生活中有此意趣的影像加以表现。他的不少作品如《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体现了乡土叙事所蕴藉的韵味。《乌篷船》为现代散文名篇，作品以书信的方式展开，款款地说话，自有一种亲切感。“乌篷船”是一种文化的符号，于周作人而言，它存储着童年乡土的记忆。作者的故乡浙江绍兴，“那里的风土人情，那是写不尽的”。而取乌篷船写来，则可十分典型而“很有趣”地画出水乡的风情风俗的图卷。作者细细地叙写乌篷船的类别、构造，篷的形状、色调，以及行船之乐之趣，在不动声色中抒写出对文化之故乡的思恋。作者自注的写作时间与地点：民国“十五年一月十八日夜，于北京”。于远离故土的京城之夜，是容易唤起童年之忆、家乡之思的。京城，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有生长着的现代文明，自具诸多利人之处，但相伴的也有人为的紧张、喧哗。当周作人遥望南方，从经验之中推出关于故乡的映象，实际上通过一种想象性的再体验，获得了一种自然由性的情趣的补偿。乌篷船无疑有一种文化的具象功能，然而又是一条盛满野趣与性情之舟。对周作人而言，或许他更看重后者的意义。所以他那些有关行舟自得的描写，差不多有些喜于形色了，这在惯于零度抒情的周作人的作品中并不多见。

周作人在《乌篷船》中自然真切地还原出乡野那种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情调。“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蕻，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而“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看随笔，喝清茶，与作者描绘的自然与人和谐相生的景象所含蕴的精神贯通。置身其间，心无物羁，自由率性而又能相和相谐。这正是人生的一种极致。《乌篷船》一篇的真义应该是关乎于此的。它以一种转意的方式，形象地给出了作家，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他所追寻的精神向度。作者从自然与人生的寻常处，提取出一种有意味的素材，构造出让生命在安逸和谐之中得以自享的世界。在和谐中享受自由生命的美意，这是人类永恒的求取。

三

读周作人的散文，我们可以获得精神上的休闲和情绪上的平和。周作人的散文于己于人大约是有些“保养精神”的价值的。这一种价值的生成，既与他注重艺术的、美的生活的题材择取、意趣情味的精神表现、闲话风致的自觉追求等密切相关，同时，也由主体情感的方式及其表达形态的某种自我规定所决定。周作人的散文语言素朴淡雅，行文从容有致，文气舒缓而无急迫之感。它如同一泓清流，不急不慢地淌着，断无大的起伏波动。这样的风格，从根底上讲，导源于作者所奉行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取守，影响作家的情感方式。对于情感的存在，周作人有一种差不多是偏见或极端的看法：“感情是野蛮人所有，理性则是文明的产物。”[16]（P387）因此，他对情感的表达有特别的要求：“人的脸上固然不可没有表情，但我想只要淡淡地表示就好，譬如微微一笑，或者在眼光中，露出一种感情，——自然，恋爱与死等等可以算是例外，无妨有较强烈的表示，但也似乎不必那样掀起鼻子，露出牙齿，仿佛是要咬人的样子。”[17]（P15）他说自己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实的人生，凡是狂热的与虚华的，无论善或是恶，皆为我所不喜欢。”[18]（P2）在周作人看来，过度的情感存在与表达，是一种“狂热的”、“虚华的”表现，皆不足取。这似乎有些绝对化，但正是这种绝对化，使周作人的散文呈现出一种平和从容的气象，使得心灵疲惫者或有精神贵族化倾向的读者，在阅读体验中获得精神上的放逸或者滋润。但周作人并没有完全拒绝情感，他说：“那种平淡而有情味的小品文我是向来仰慕，至今爱读，也是极想仿做的。”[2]（P213）周作人看重的是情感的品质、品位，求取的是情之“味”，偏爱的是情之“平淡”，在他看来，平淡之情才是真情。

为了求取情之平淡有味的审美效果，周作人一方面注意选取本身缺少激情的对象，叙写寻常的生活遭际，寻常的自然景象。周作人好写草木虫鱼之类的散文，这与他早年的兴趣有关。他说：“我从小时候和草木虫鱼仿佛有点情分，《毛诗草木鸟兽鱼疏》、《南方草木状》以至《本草》、《花镜》都是我爱读的书，有一个时候还曾寝馈于《格致镜原》。”[5]（P167）其实，“草木虫鱼”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是偏离主流社会生活后对日常生活亲近的一种代称。写茶道美食、写乡间物什、写书生生活，自然无需大呼小叫，一切以原态呈现，闲话人事物景，随意称心而出。无疑这样的写作，与周作人所操守的散文观应是相合的。《故乡的野草》是周作人草木虫鱼类作品中的一篇。对于故乡，作者当然自有一种情怀，但他并不加以渲染。“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居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到他。”周作人对乡情的把握很有分寸。“有时也要想到他”，言有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则是说情也寻常。基于这样的表情定调，作者很自然择取并无太多色彩的“野菜”作为叙写乡土记忆的材料。荠菜、草紫、乡俗、乡景，在舒徐的叙述中，作者的乡情自然平淡地融和在其间。情看似冲淡，而味却别是悠远。

另一方面，周作人对有情感强度的人物事件作有节制的处理。这种处理使得语言表面所见的情感淡化与内蕴情感的丰富真挚之间形成了一种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造就了周作人散文审美的某种张力。审美的张力对读者产生了召唤性的艺术魅力。《初恋》是一篇对情感作淡化处理的代表作。《初恋》写于 1922 年的 9 月，时隔初恋的发生 20 余年：“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罢。”当他的这种私人化的心灵际遇，作为一种被述说的对象时，情感话语就被作者纳入到预设的轨道中。作者以时间的间距疏离叙述的对象。“那时”这一表示时间的远指代词，在表情方面有一种疏离对象的效果，给读者的感觉仿佛是作者在讲述一段情感已经沉淀的人生往事。方法之二，是作者以清淡笔墨，状写身处其时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是朦胧微妙的，是“淡淡”的，是本色真实的。“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迷濛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作者在这里所写是一种爱与被爱都还无法确定的恋情。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真实地表现出恋爱主体尚未进入角色时的“初恋”的感受与心态，恰如其分地还原出人物恋之“初”的本真。

周作人的一部分散文是可以被指称为文化散文的，同时也可以命名为“智慧散文”。周作人散文往往不求表现奇异的题材意旨，而重视表现他所说的“常识”。周作人对“常识”有一解释：“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以称之曰智慧。”[5]（P872）周作人的“智慧”之文中既有人情，也有智识，或两者兼而有之。智识之文的生成，归因于周作人的博知以及文化人或曰读书人身份的自我确认。文化之于周作人的散文，不仅在于其间表现出地域或民族所具有的人情风俗，而且其间也充盈着一种文化散文所应有的书卷气。这种书卷气，原是书生本色的一种表现。由“叛徒”而“隐士”，周作人执着于“闭门读书”，并从中寻得意趣：“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5]（P872）周作人读书并不是为了专门学问的研究，读书有时成了他超越现实功利的生活本身。这样，周作人的读书就见杂了。他曾说：“不佞从小喜杂览。所喜读的品类本杂，而地志小书为其重要的一类，古迹名胜固复不恶，若所最爱者乃是风俗物产这一方面也。”[19]（P125）书读得多，读得杂了，写作时自然就会信手拈来，有时似乎有些不加限制，以致于有人讥之为“掉书袋”。但总的说来，杂类入文既使周作人小品滋生出博识之趣，又使行文平添了文化的色彩。《苍蝇》被文学史家阿英颇为看重，以为这是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由“战斗”走向逃避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作者开篇叙写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小时候捉玩苍蝇的往事，并引用古希腊路吉亚诺思《苍蝇颂》中“苍蝇在被切去了头之后，也能生活好些时光”的文字，为苍蝇的玩法作注。中间插入有关苍蝇的神话，采入诃美洛思史诗和法布尔《昆虫记》中的有关资料，言说“苍蝇的固执与大胆”。后又以《诗经》，“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等诗文，例说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苍蝇形象。周作人采古集今，取域外兼得国中，既写苍蝇本身生性，又说苍蝇文化关联性。这样作品就形成了一种只有博知者才能调制出来的博识之趣。这种博识之趣，对于读者也另有一种精神休闲的意义。

周作人的散文为中国现代散文史提供了一种精神类型。言其“一种”，这是因为一方面周作人的散文并不能指代现代散文的整体，或可以此排他；另一方面，周作人的散文在现代散文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这种不可或缺性，体现于作家主体与文本之间实现的充分的对应性上。具有自由精神的作家与渗透着主体性情、形态随意的作品之间是高度融合的。主体与文本相统一而凸现的精神放逸的自在，这是一种可以被视为散文主体精神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一种现代性的建构。“散文的周作人”，换言之，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情感方式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他对所设定的散文的执着偏爱，实际上就是他对于自身所取所有的执着偏爱。“周作人的散文”，或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创作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参考文献：

[1] 郑振铎.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C].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2] 周作人. 永日集·桃园跋[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3] 胡适. 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A]. 杨犁. 胡适文萃[Z].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
[4] 周作人. 过去的生命：序[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 周作人. 知堂书话[M]. 长沙：岳麓书社，1986.
[6] 周作人. 自己的园地：旧序[M]. 长沙：岳麓书社，1987.
[7] 厨川白村. 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塔[M]. 鲁迅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8] 王钟陵.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散文卷[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9] 郁达夫.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C].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10] 周作人. 雨天的书[M]. 长沙：岳麓书社，1987.
[11] 陈为民. 周作人代表作[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12] 周作人. 秉烛后谈[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3] 黄乔生. 周作人书话[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14] 张明高，等. 周作人散文：第三集[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15] 周作人. 文艺上的宽容[A]. 自己的园地[M]. 长沙：岳麓书社，1986.
[16] 周作人. 谈虎集[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7] 周作人. 看云集[M]. 北京：开明出版社，1992.
[18] 周作人. 书房一角[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9] 周作人. 永日集[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英文摘要下转第 61 页）

[责任编辑：邵青莲]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

参考文献：
[1] [英] 杨格(Edward Yong). 论独创性的写作[A]. 伍蠡甫. 西方文论选：上卷[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 周宪. 20世纪西方美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 [德] T. W. ADORNO.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A]. in J. E. ALEXSANDER. (ed). **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Debates**[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 [法] 波德里亚(Baudrillard). 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德] 霍克海默，阿多诺. 启蒙的辩证法[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邵青莲]

The Popular Literary Production as a Process of Manufacturing—A Critical Research

LI Yong

Abstract: If the production of pure literature is original creation, the production of popular literature is a process of standardized manufacturing. Popular literature is produced for the market. It is controlled by the logic of commodity exchange and is restricted by the needs of the masses in the modern society. All these make popular literary production a process of manufacturing. There are three features of popular literary production. The first is standardization, the second is planned production and the third is reproduction.

Keywords: popular literature, production, manufacture

（上接第48页）

Zhou Zuoren in the Essays and the Essays by Zhou Zuoren

DING Xiao-yuan

Abstract: Zhou Zuoren is seen better in his essays than in his poems or in his stories. "Zhou Zuoren in the Essays" means his outlook and ambition are best expressed in his essays. His idea of philosophy, his attitude toward life, and his personal likings and hobbies can all be found in his essays. They are in effect a verbalization of himself, and a presentation of his individualized spirit. He, therefore, could be regarded as number one in modern essays to have realized an accommodation between discourse and its producer.

Key words: Zhou Zuoren, essay, subject-object, text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